

简评《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

董文武 张文涛

毒品问题在近代中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险恶手段之一。《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宏斌教授继《禁毒史鉴》《近代中国价值尺度与鸦片问题》之后,研究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又一力作,于2005年9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在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毒化活动为断限,以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整套对华毒品侵略政策为视角,开拓了研究角度,深化了研究层面。总的来看,本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 研究视角的拓展

关于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研究,史学界对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问题已有较多论述,然而对日本在华毒化活动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渐得到重视,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相关论著。但总体上看,这些已有论著只是进行了个案和局部研究,无论在研究范围上,还是在资料占有与考辨上都存在着明显不足。如,日本学者江口圭一的《旧中鸦片战争》由于没有利用中国现存的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其研究重点仅限于蒙疆地区。美国学者马一·布恩在其《鸦片史》中考察了世界范围内的毒品起源、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历史,而对日本侵华毒品政策则很少涉及。中国台北学者李恩涵在《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集刊》发表的关于日本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贩毒活动的四篇文章,虽然涉及四个地区,但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大陆各地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视角受到限制。中国大陆学者蒋秋明与朱庆葆合撰的《中国禁毒历程》以及苏智良撰写的《中国毒品史》,尽管对于日本侵华时期的毒品政策都有章节涉及,但其研究侧重点不在政策上。总之,该领域的研究尚缺乏综合性的学术专著。本书则是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施的毒品政策及危害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视角开阔了不少。

二 研究方法的更新

第一是定量分析法:作者在用文字论述日本毒品政策的同时,还运用了大量精确的统计数据和简明的图表进行参照说明,从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二是图表,据统计,作者在书中所用图表就多达66个。这些图表分别对日本在华各占领区历年的鸦片收入、吸食人数、鸦片价格、播种面积、收购销售和输入总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如,在论述日本对台湾实施鸦片专卖制度导致当地吸毒人数急剧上升的问题时,运用图表进行分析,从台湾历年吸食毒品人数、占总人口比率和烟膏消耗量3个方面做了考察,这使得论证更加清晰直观。二是数据,作者在考察日本利用毒品掠夺中国社会财富时便运用了此种方法,列举了精确的统计数据:1897—1941年,日本在台湾的鸦片收入为94695033美元;1932—1940年,日本在满洲国的鸦片收入为73745220美元;1907—1920年,大连都督府的鸦片收入为8823500美元;1938—1944年,日本在蒙疆地区的鸦片收入不低于5871万美元;1938—1945年,日本在华北的鸦片收入约为3110万美元;1938—1943年,日本在华中

鸦片收入为 80547408 美元；1944—1945 年，汪伪南京政权鸦片收入至少为 6061714 美元；以上一项合计为 353682875 美元。通过列举这些具体数据，使我们对日本利用毒品在中国搜刮巨额财富的情况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第二是区域研究法：作者以地域为专题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台湾、东北蒙疆、华北、华中和华南等 6 个占领区的毒化活动分别加以研究，论述了各地区毒品政策的不同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在分析日本把蒙疆作为鸦片生产基地的原因时指出，这主要是由该地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蒙疆地处偏僻，便于掩盖大规模毒品生产，也便于控制管理；其次，该地区农民原本就有种植罂粟的技术经验和习惯；再次，该地区是宁夏、甘肃等省鸦片运往华北、华中等地的交通要道。因而，不同的地域特点决定了日本侵略者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作者在研究日本对蒙疆采取的毒品政策时，还分析了该地区与其他占领区的关系，指出日本把蒙疆作为鸦片生产基地主要是为了满足东北、华北、华南等地的鸦片需要。作者运用这种区域研究方法，使得对日本侵华毒品政策的研究既全面又深入。

第三是正反对比法：作者在书中不断地把日本侵略者之纵毒与中国政府之禁烟进行对比，从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通过对华毒品政策达到其聚敛钱财、以毒养战、戕害华人、灭亡中国的目的。如，在日本全面侵华以前，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开展了严厉的禁烟运动，毒品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既无人敢公开贩卖，也没有人在公众场合吸食，烈性毒品的买卖更是少见。及至南京陷落后，日本侵略者不但设立了许多公开贩卖毒品的“土行”，而且还鼓励旅馆、饭店、妓院等场所提供鸦片服务，烈性毒品的买卖、吸食也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再以绥远的情况为例，1937—1938 年，绥远西部地区仍然掌握在傅作义率领的中国军队手中，绥远省政府继续实施严厉的禁毒法令，打击了毒品的走私贩运，消灭了大面积的罂粟种植，减少了吸食毒品的人数；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却在其占领的绥远东部地区利用一切手段鼓励鸦片的种植与贩卖，各城镇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鸦片烟馆，连药房也成了兜售毒品的重要场所，鸦片成为社会公认的“黑金子”和社会交往的必需品，甚至可以成为结婚彩礼和行贿受贿的物品。面对相同的毒品问题，绥西禁而绥东纵，在同个地区的两个政权采取如此截然相反的政策，是由两个民族根本利益的矛盾所决定的。通过大量正反事例对比，从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日本侵略者对华毒品政策的险恶用心。

三 史料的发掘与利用

该书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现有的中外文资料，其中档案资料主要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山西、内蒙古、辽宁、河南、河北、张家口、承德等档案馆馆藏的有关鸦片烟毒的资料。报纸资料主要有《申报》《大公报》《文汇报》《晨报》《民国日报》《新华日报》《中华日报》《新闻报》《字林西报》《华北日报》《南京新报》等相关资料。期刊资料主要有《东方杂志》《东京经济杂志》《禁烟专刊》《禁烟特刊》《禁烟纪念特刊》《湖南禁烟月刊》等相关资料。文史资料主要有《广州文史资料》《武汉文史资料》《厦门文史资料选辑》《河北文史资料》《张家口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等。外文资料中，英文资料有 Yu—Ming 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等；日文资料有《日中战争时期的鸦片政策——以蒙疆政权资料为中心》、《续现代史资料·鸦片问题》等；另外还有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扎伊采夫编著的《东京审判》等。其他重要的资料还有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孙邦主编的《经济掠夺》罗运炎所著的《毒品问题》以及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使用这些资料时不是拿来就用，而是经过了仔细的考辨，取舍十分谨慎。例如，在关于“华中宏济善堂”成立时间的问题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 1939 年 5 月，而作者通过对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所存相关资料的认真考辨，指出成立时间应为 1938 年 3 月；在确定波斯鸦片输入华中地区的总量这一问题时，朱庆葆在其《日本侵华毒

品机构——华中宏济善堂研究》文中认为是12300箱，而本书作者则通过对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日中鸦片战争》原文资料的分析，认为输入总量应为4400箱。这些例子不但综合利用了各种相关资料，还对所用资料进行了精审的分析和辨别。

四 研究中的缺失

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主次比例失衡。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日本侵华毒品政策，虽然各章节也论述了日本在中国各地的毒品政策，但关于纵毒、贩毒、禁毒等史实部分却占用了大量笔墨，从而显得主次关系失当。例如，“丧失人性的贩毒者”、“为虎作伥的朝鲜贩毒者”、“日军占领以前的华中禁毒运动”、“席卷长江下游城市的青年学生抗议运动”、“鸦片大王叶清和的罪恶一生”等小节。这些具体的史实对更好的理解日本毒化中国的历史是有用的，但对于研究日本对华实施的毒化政策却关系不大。其次，横向概括不够。本书以地域划分来研究日本侵华毒品政策，虽然便于全面系统地对问题进行考察，但难免造成体例上的条块分割。作者通过“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傀儡政权满洲国的《鸦片法》”、“1940年的蒙疆鸦片政策”、“日本使馆与‘对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方针’的提出”、“华中宏济善堂的纵毒新措施：种植与采办”、“厦门鸦片的大盘、中盘与小盘”6个小节，分别论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占领区不同的毒品政策，对各地毒品政策的内在联系也进行了分析，但仅仅将其归纳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机关犯罪”，就显得有些简单。因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的毒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分析各地毒品政策的异同关系，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日本侵华毒品政策。再次，纵向分析不强。日本在华实施毒品政策的时间断限不尽相同，本书将整体的时间断限定为1895年至1945年，如日本对台湾的鸦片“渐禁”政策（1895—1945年）；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1931—1945年）；蒙疆鸦片生产基地与专卖制度（1935—1945年）；日本对华北的鸦片统制（1935—1945年）；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1937—1945年）；日本在华南地区的纵毒活动（1938—1945年）。不难看出，日本对华毒品政策的发展演变，是伴随着日军逐步扩大对中国领土的不断侵占而来的。本书虽然从不同时段探讨了日本在各占领区的毒品政策，却未能对日本对华毒品政策纵向的演变轨迹进行理论概括。

（作者董文武，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文涛，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志民）

“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

2008年12月19—20日，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支援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了“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国际学术讨论会。《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宋成有、徐勇、王新生、臧运祜等6名中国学者，以及朝鲜社会科学院高正雄等6名研究员和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李薰等6名研究委员发表了论文。北京大学教授沈仁安、王晓秋、李寒梅，以及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延边大学教授朴灿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柴璠等参加了评论。

本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是针对日本将于2009年进行新一轮历史教科书审定的现实而召开的。中、朝、韩三方学者着重考察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沿革，分析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事实与根源。大家一致希望日本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以正确的历史教育下一代，共创东北亚和平共存、合作共赢的光明未来。（王元周）